



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

金荣洲

(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2)

摘要:古代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大危机事件,从其潜伏到爆发,是唐王朝危机管理对策的失败,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危机管理案例。

关键词:安史之乱;公共危机;管理意识

中图分类号:D691.9=4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4-0544(2010)11-0062-03

唐玄宗李隆基(685-762年),是大唐第七位皇帝,史载他个人素质优秀,善骑射,通音律、历象之学,多才多艺。年轻时期,他在处理内政外交等方面都表现突出,但是中晚年以后在处理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危机时,却显得力不从心,显示出他在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方面的不足。下面谨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例进行说明。

一、危机潜伏期

唐自建国以后,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,社会也得到极大发展,出现了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的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政治清明的局面。但是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危害性极大,成为盛唐由盛转衰的关键。

1. 帝国精英勾心斗角,严重损耗帝国的行政资源

在帝国政府内部,当时的帝国精英,太子、宰相李林甫、其后的杨国忠、大将哥舒翰、封常青、高仙芝、安禄山、安思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,相互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。作为帝国政府的掌门人,玄宗皇帝有时候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平衡大臣们的相互争权、倾轧的非合法的內耗中,而不是如何想办法化解帝国即将面临的更大的危机。

如安禄山见太子李亨(未来的唐肃宗)不拜,解释说“臣蕃人,不识朝仪,不知太子是何官”,这里面应该是安禄山在故意装糊涂,同时也是在向玄宗表示忠心。但是却把太子得罪了,以至于太子顺着张九龄、杨国忠的话茬,“亦知禄山必反,言于上,上不听”。安思顺也提醒玄宗,安禄山有谋反的可能。^[1]李林甫为了杜绝边帅,包括安禄山的入相之路,挑战自己的相位,以胡人不知书,“乃奏言:‘文臣为将,怯当矢石,不若用寒峻胡人;胡人则勇决习战,寒族则孤立无党,陛下诚心恩洽其心,彼必能为朝廷尽死’上悦其言,始用安禄山”。直接废止了延续百年的由名臣任边帅、边帅入相的传统国策,但玄宗没有认识到潜在的隐患。^[2]李林甫死后,杨国忠也把安禄山看做唯一政敌,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和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,因“禄山视之蔑如也,由是有隙”。于是总在玄宗面前挑拨,“国忠寡谋矜躁,谓禄山跋扈不足图,故

激怒之使必反”。^[3]安禄山为在博弈中争取主动只好一再向玄宗表示效忠:“臣本胡人,陛下宠擢至此,为国忠所疾,臣死无日矣。”^[4]安禄山、哥舒翰之间也是积怨甚深。^[5]杨国忠为扩大反对安禄山的力量,与哥舒翰结成政治同盟“厚结哥舒翰,共排安禄山”。^[6]

2. 边患严重及安禄山开始坐大

唐初以来,边患一直是唐前期历朝统治精英面临的巨大挑战。北方的突厥、西方的吐蕃,东北的契丹、奚等族,时附时叛,内侵频仍,给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。奚和契丹,唐称之为两蕃。唐朝建立后,曾在当地设置府州,任命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。但自则天以后,唐与契丹失和,696年契丹李尽忠和孙万荣叛乱,曾攻占营州,围困幽州,导致辽西大乱,持续一年多。^[7]先天元年,奚、契丹二万骑兵入寇渔阳,“幽州都督宋景闲城不出,虏大掠而去”;^[8]开元二年(714年)“时契丹和奚与突厥连和,屡为边患”。“其年(714年)八月,吐蕃大将达延、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,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,掠群牧而去”。^[9]

为了扭转“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”的不利局面,树立中央权威,刚刚接手帝国政府管理权的玄宗曾力排众议,于“开元二年夏,诏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众二万,出檀州道以讨契丹等”。由于决策层对契丹的强悍估计不足,最后“尽为契丹等所覆,(主帅薛)讷脱身走免”。^[10]

为此,玄宗开始物色熟悉东北地区情势的人选。熟悉东北民情的安禄山开始脱颖而出。

根据《旧唐书·安禄山传》可知,安禄山出身卑微,因为当过诸蕃互市牙郎,熟悉边境民族风情,才大难不死,反受重用。由此开始揭开了其人生的新篇章。开元二十四年(736)任平卢讨击使、左骁卫将军,开元二十八年(740)升任平卢军兵马使。开元二十九年(741)由幽州调到营州,担任营州都督、平卢军使、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,防范、监视奚、契丹。天宝元年(742)升任刚设立的平卢节度使,第三年兼任范阳(幽州)节度使、河北采访处置使。《旧唐书·地理



志》说：“范阳节度使临制奚、契丹”。《新唐书·方镇表》所记开元 20 年“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，增领卫、相、洛、贝、冀、魏、深、赵、恒、定、邢、德、博、棣、营、莫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”，加上所兼的河北支度营田使、河北海运使，如此整个河北军政都归安禄山所管。天宝七年(748)由柳城县开国伯进爵为柳城郡开国公，又过两年，五月，进爵为东平郡王，成为盛唐以来第一个被封为郡王的将帅，唐朝将帅封王也从此开始。751 年 2 月又兼云中太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当时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，他一人兼领三个。754 年，加尚书左仆射，赐实封千户。应该说在 22 年间(732—754)，安禄山青云直上，直接掌握武装超过十五万的部队，其兵力占全国镇兵总数百分之四十，其中军马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，控制范围包括今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及辽西大部分地区。

玄宗在开元末到天宝以后，由于年事渐高(开元 29 年已经 56 岁了)，加上个人情感屡受重大的挫折和打击，^[11]执政力求稳定，希望有一个能力强且忠于自己的人才来维护边境安定，这应是选择安禄山的指导方针。所以在既定的行政框架内，重用安禄山，玄宗是放心的，同时也安排安禄山逐步进入帝国决策层，充分的让安禄山享受到了较高的政治、经济待遇，以笼络其心。

在权力制衡、防范领军大将尾大不掉方面，帝国政府已有制度化的安排：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二》载“凡诸军镇，使、副使已上，皆四年一替”，^[12]且唐代的各级官吏，上至刺史，下至参军等，均由中央直接任免与调动。由此可知，唐王朝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说：“自唐兴以来，边帅皆用忠厚名臣，不久任，不遥领，不兼统，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，其四夷之将，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，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”。^[13]

但是玄宗对安禄山寄予厚望和充分的信任，无形之中为安禄山的对抗中央帮了忙。因为他把对安禄山的有效管理排除在外，安禄山几乎成为唯一不受帝国法律管辖的封疆大吏了。安禄山自 742 年担任平卢节度使，745 年兼任范阳节度使，751 年兼任河东节度使，到其反时，长达 10 多年没有换地方。这说明从制度上防范边帅坐大，化解危机，恰恰漏掉了安禄山！可能玄宗考虑了东北特殊的地情，出于战时统筹和便宜指挥的需要，兼统也是可以理解的，甚至在军事情况比较复杂的边境地区，是必需的。但是这种例外恰恰是最为危险的，尤其在其掌握了 20 万的虎狼之师以后。高力士于开元二十三年、天宝十载、十三载的三次与玄宗的问答里，^[14]其中有两次涉及边帅问题，高力士明确提醒玄宗：“边将拥兵太盛，陛下将何以制之？臣恐一旦祸发，不可复救”时，玄宗当时就没有考虑安禄山的坐大问题，只是说“朕徐思之”。^[15]更甚的是，根据开元二十七年(739)修成进上的《大唐六典》卷五“兵部郎中”条可知，开元二十五年敕允许节度使拥有募兵权，自己可行募士兵，在此之前是由府兵定期服役。但是，正是这些关键点的疏忽，使帝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出现不必要的安全漏洞，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悲剧。

二、危机爆发

正是由于帝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防范

制度，疏于管理，致使安禄山日渐坐大，具有反抗中央权威的资本。加上此时的唐帝国名实难符，社会危机连连，一有社会的巨大动荡，就会爆发社会危机。帝国的精英们，尤其是杨国忠为验证自己安禄山必反的预言，更是不余其力的寻找机会制造事端，挑战安禄山的忍耐程度，最终使得这场破坏力之大、影响之深远的危机爆发。史载“国忠寡谋矜躁，谓禄山跋扈不足图，故激怒之使必反”。^[16]在安禄山与杨国忠的权力博弈中，杨国忠一直居于进攻态势，而安禄山处于劣势，杨国忠先是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第宅，逮捕安禄山的同情者多人，并秘密处死。借口韦陟贿赂御史中丞吉温，求救于安禄山事件，又将安禄山在京亲信吉温贬为外官，以切断安禄山的耳目。^[17]安禄山求向玄宗，未能得到明确的政治保护承诺，十分担心一旦玄宗死去，失去保护伞，所以经常问“天子安稳否？”^[18]而这时，玄宗仍未感到事态严重，“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，已令张垪草制。杨国忠谏曰：‘禄山虽有军功，目不知书，岂可为宰相！制书若下，恐四夷轻唐。’上乃止。乙巳，加禄山左仆射，赐一子三品、一子四品”。^[19]对于谋取同平章事，应该是安禄山想取得与杨国忠平起平坐的权力资本，也是玄宗提升安禄山在政治中枢话语权的努力。后来安禄山“求兼领闲廐、群牧；庚申，以禄山为闲廐、陇右群牧等使。禄山又求兼总监；壬戌，兼知总监事。”^[20]应该说玄宗尽量满足了安禄山的权力欲望，但对玄宗来说，杨国忠屡言安禄山要反，纯属中央与地方两个精英间的个人恩怨。

天宝十四载(755 年)，安禄山在“孔目官严庄、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讖，劝之作乱”的鼓动下，开始做反抗中央的准备。二月，“使副将何千年入奏，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”，尽管宰相韦见素和杨国忠表示反对，但是玄宗本着“禄山，朕推心待之，必无异志”，答应了安禄山的请求。后来根据与大臣召开的殿前会议，答应考虑杨国忠提出的“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，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，杨光翊为河东节度使”，^[21]以分安禄山大权、防范其可能造反的危机解决方案。贾循、吕知诲还是安禄山手下大将，方案含有离间其关系的意思。但是玄宗并没有把任命诏书发出去，而是“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，潜察其变”。结果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辅璆琳很容易被安禄山的假象所糊弄，“(辅璆琳)还，盛言禄山竭忠奉国，无有二心”，还替安禄山说好话。^[22]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危机潜伏期，信息是不对称的，玄宗不了解安禄山的情况，没有充分利用帝国的信息来源。而相反，安禄山对帝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自此，“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，使京兆尹围其第，捕禄山客李超等，送御史台狱，潜杀之”。“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，供奉在京师，密报禄山，禄山愈惧。”安禄山上表奏杨国忠罪状二十余条，替自己辩护。六月其子成婚，“诏召禄山观礼，禄山辞疾不至”。七月，“禄山表献马三千匹，每匹执控夫二人，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。河南尹达奚珣疑有变，奏请‘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，官自给夫，无烦本军。’于是上稍寤，始有疑禄山之意。会辅璆琳受赂事亦泄，上托以他事扑杀之。”后来玄宗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“十月于华清宫待卿。”安禄山更不敢来了，但是玄宗仍没意识到将会爆发空前大危机，没有做任



何政治、军事准备。^[23]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”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、奚、契丹、室韦共 15 万人,号称 20 万,以诛杨国忠为名反于范阳。天宝初,唐朝共有平卢、范阳、河东、朔方、陇右、河西、安西四镇、北庭及西川剑南九个节度,兵马约 50 万。除剑南节度外,均在北方。其中安禄山统领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,兵马 20 万,最强。哥舒翰统领河西、陇右二镇,兵马 15 万,次之。安思顺统领朔方,兵马 6.5 万,又次之。高仙芝、封常清统领安西、北庭二镇,兵马 5 万,最少。但是安禄山选择叛乱的时间,正好是西北节度使诸镇中的几名主将都不在任上。原任安西都护高仙芝已于天宝十载回长安任右羽林大将军;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于十四载二月入朝,道得风疾,废疾在家;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于十四载冬入朝,叛乱发生时正在路上,十一月十六日辛未才到京。

十一月十五,在叛乱发生七天之后,“上闻禄山定反,乃召宰相谋之”,召开宰相会议商讨应对危机的措施,杨国忠洋洋得意,其他“大臣相顾失色”。由于信息闭塞,会议对叛情没有完全掌握,也没有迅速拿出实质性的危机解决方案,只是派特进(退休高级官员)毕思琛到东京(洛阳)、金吾将军程千里去河东募兵拒贼。十六日,刚回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认为是小事一桩,“请走马诣东京,开府库,募骁勇,挑马捶渡河,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!”。唐玄宗到现在也没有把安禄山的反叛当回事,就“以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”。由于当时安西、北庭、河西、陇右诸镇兵马都来不及调遣,就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,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。以朔方右厢兵马使、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,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。置河南节度使,领陈留等十三郡,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。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。诸郡当贼冲者,始置防御使。丁丑,以荣王琬为元帅,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,统诸军东征。出内府钱帛,于京师募兵十一万,号曰天武军”。十一月二十一日,“斩太仆卿安庆宗,赐荣义郡主自尽”。^[24]

应该说,到这个时候玄宗已经有了武力解决冲突的想法,但是事态发展远远超出玄宗的想象。未几,潼关失守,玄宗逃亡四川,途中演出兵谏玄宗,缢死贵妃的悲剧。而且,高仙芝、封常清、哥舒翰三位叱咤一时的边塞主将也相继被杀、被俘,万全之地,一朝而失。玄宗退位后,唐肃宗李亨只靠郭子仪、李光弼朔方节度使一支兵马平定叛乱,直到代宗时才结束安史之乱,整整付出君臣三代人的努力。公元 763 年,历时八年之久的危机被平定,然而“东周之地,久陷贼中,宫室焚烧,十不存一,百曹荒废,曾无尺椽,中间畿内,不满千户,井邑荆棘,豺狼所嗥,既乏军储,又鲜人力……人烟断绝,千里萧条”。加上此后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,盛唐气象已不复重现了。^[25]

从《资治通鉴》对这段历史的叙述,我们从中能够看出作为唐代很有作为的皇帝,唐玄宗在其中晚年时的危机管理意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。我们看到,当时承平已久,但社会差别悬殊,矛盾丛生,危机四伏。尽管在应对国内自然灾害、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冲突、防范帝国权力中枢矛盾显化、皇权旁落、西北将领坐大方面,玄宗危机意识很强,比如对曾担任朔方、河东、河西、陇右节度使的王忠嗣和户部侍郎、御史大夫、京兆尹王鉉等处置,干净利落,毫不手软。^[26]但是在防范安禄山尾大不掉上,由于玄宗个人的情感的偏爱,危机管理措施没有起到防范的作用。当危机爆发后,玄宗在危机爆发后好几天才收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,而且一开始还不相信。等到确认下来,又有一部分措施失当,没有注意整合一切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资源和力量,缺乏全局意识、风险意识,认识不到这场危机的危险程度、破坏程度;急急忙忙杀掉安禄山的儿子(实质是人质)、催促哥舒翰与安禄山灵宝决战,导致潼关失守、错杀高仙芝、封常清等,致使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司马光就曾批评晚年的玄宗危机防范意识淡薄,“明皇恃其承平,不思后患,殫耳目只玩,穷声技之巧,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,欲使前莫能及,后无以逾,非徒娱己,亦以夸人”。^[27]安史之乱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危机管理案例,为后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管理经验,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很多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2][4][5][6][13][15][17][19][21][22][23][24][20]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二一七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3]欧阳修.新唐书(卷二〇六)杨国忠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7]新唐书(卷四)则天后本纪[M].第 51 页.
- [8]资治通鉴(卷二一〇)唐纪二十六[M].第 6678 页.
- [9][10][后晋]刘昫等撰.旧唐书·列传(四三)薛讷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1]谢元鲁.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[J].社会科学研究,2005,(2).
- [12]旧唐书(卷四三)职官志二[M].
- [14]郭提.高力士外传·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16]新唐书(卷二〇六)杨国忠传[M].
- [18]新唐书(卷二二五)安禄山传[M].
- [25]旧唐书(卷一二〇)列传第七十.郭子仪传[M].
- [26]资治通鉴(卷二一五、二一六).天宝五载[M].第 6882-6883 页、十一载条,第 6912 页.
- [27]资治通鉴(卷二一八).天宝十五载条[M].第 6994 页.

责任编辑 全瑞中